

乡村武术、民间权威与乡村社会的融合治理机制研究

前言

本研究基于当前国家大力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时代背景，通过对宗教信仰、仪式程序以及权力权威的系统分析，试探究乡村传统武术的内在含义，进一步厘清传统武术与乡村社会的联系。研究结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以国家权威为顶点建立一个“金字塔”的三角体式治理模式，并就新时代乡村民俗体育的基本走向及具体发展路径展开探讨，这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响应，也是为丰富和完善当代乡村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保护与传承优秀民俗体育活动提供借鉴参考，并最终落脚到乡村治理与传统武术保护上。

关键词

乡村武术；民俗体育；乡村治理；融合发展

1 研究背景及缘起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2020年12月28日到29日举行的中央农村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村全面进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也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环。

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对城市和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1]。例如，李萍等学者通过探究现代乡村危机的形成原因以及行动逻辑指出，扎根于乡村的民俗体育彰显着人们的情感，它不只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它有助于一个民族产生强有力的凝聚力，加强不同民族间的认同感，体现社会和谐的价值内涵^[2]。一方面，武术的仪式性与表演性等特点使其极具观赏性。政府与

民间的合作管理，使其逐步规范化且具有官方效应，不但可以将其作为传播媒介来强化国家与民族文化意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还可以让乡村武术在系统的管理下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后更广泛的治理^[3]。廖上兰等认为民俗体育既是乡土文化的优良载体，更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动力，嵌入乡村治理是民俗体育现代性传承的必由之路，既能赋予民俗体育新的文化意义，也能将民俗体育的气血注入时代脉搏^[4]。同时乡村是保留武术传统、延续武术文化根脉的重要场域，借助传统武术这一仪式性的活动不但可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良好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可作为乡村治理研究深入探讨的新方向。

2 宗教与信仰——乡村武术的内涵以及乡村社会运作的“源动力”

宗教之所以引起社会学的兴趣，不是因为它描述了社

会秩序，而是因为它塑造了社会秩序^[5]。作为普遍存在且具有特殊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宗教所涉及的信仰和展现信仰的行为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驱使人们与超自然的“神灵”产生联系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安排。涂尔干认为宗教发源于群体生活，宗教情感存在对社会的崇拜与畏惧心理，因此宗教产生于社会生活^[6]，这一论述直接体现了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联。

瓦赫指出，宗教的影响是双重的：有积极的或连贯的、整合的影响，也有负面的、破坏性的、分裂的影响^[7]。对于积极层面，宗教有其独特的控制与整合效应，其完备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缓和冲突、消除社会矛盾；对于消极层面，托马斯·奥戴提出了宗教功能失调的方面——情感慰藉的消极作用：阻止人对自然的控制；使价值和准则凝固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阻止新的认同产生；不重视个人价值^[8]。

社会生活是孕育宗教的必要场所，而宗教为社会生活提供思想与观念指导。方国清提出武术的三大信仰特征分别是技击信仰、传说信仰和道德信仰^[9]。乡村武术作为传统武术的代表之一，很大程度也是对过去信仰文化的一种传承形式，同时由于村落宗教信仰的影响，乡村武术也是作为当地社会结构以及秩序管理的一种参与形式。

3 仪式程序——乡村武术发展与社会治理问题的“反射镜”

如果说宗教信仰是一种观念，仪式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学界通常利用神圣与世俗来定义和区别宗教与社会生活。对此涂尔干进行系统的解释，他认为神圣领域与凡俗领域的划分，区别只是人们赋予的不同意义^[10]，而宗教仪式则是人们与神灵交往的重要手段；其次，仪式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对圣物崇拜态度的具体的、直接的表现方式。王若光在《“飞龙在天”：端午龙舟竞渡习俗考源》一文中就详细分析到无论是人物传说还是禳解消灾，龙舟竞渡中都蕴含着人们的信仰，希望借此能达到祭奠和祛疾避疫的目的^[11]。这既表达了对龙图腾的敬畏，又体现了人们世代沿袭的禳解习俗。

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上到统治阶级顶端所进行的祭祀仪式，还是下到平民所进行的龙舟竞渡、舞狮请神等民俗活动，都具备相同的特点。即都是把人们团结起来，用于集体行动和集体力量的乐观态度来替代恐惧和混乱，同时把受到扰乱的有关各方的关系重新平衡或重新建立起来^[12]。作为一种实践，涂尔干认为仪式的社会功能在于增强社会的凝

聚力，把社会的价值和情感灌输给个人。

作为仪式活动的乡村武术在传承过程中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而作为节庆展演的乡村武术又能充分发挥内在的宗教信仰观念，使得其具有禳解效应。人们需要这种类似民俗体育的仪式来释放心中的压力与怨愤，如此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进一步巩固社会结构。

4 权力与权威——武术传承与社会秩序的“支配者”

传统社会，无论中西，权力与权威一直都是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们不能把权力简单地看作统治阶级的特权。事实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既不是契约的产物，同时它也不能被拥有、被剥夺或被转让。人的权力与生俱来，而权力大小取则决于被支配者服从于支配者的程度。这也是为何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都是由于拒绝服从所谓官方支配，而逐步通过斗争形式取代旧的统治对象，建立新的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是可逆的不是不动的、是不稳定的而不是来自某个具体的职位或法典^[13]。权力与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的运转离不开权力之间的运作。

不仅是近代，中国传统社会也有所体现。民间权威的所有者永远都是“知识阶级”或精英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群，即所谓的“乡绅”^[14]，他们这类群体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知识或经验来指导社会运作并连接官方与民间对话形成“双轨制”的社会结构，以此缓解官民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当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甚至改善则这一部分人的民间权威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循环往复^[15]。乡村最核心的一个特性就在于它的人情关系，即使如今，乡村依然有着明显“非正式制度社会”的特征，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武术传承人时刻不忘“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以乡情关照赢得村民的支持^[16]。

事实上，乡村武术传承人就是一种权力与权威的代表形式。通过这种权力与权威来传播乡村武术文化使其更具说服力，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与结构的稳定。然而面对现阶段乡村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治理问题，我们急需为乡村治理机制寻找新的出路。

5 “三角关系”——乡村武术、民间权威与乡村社会的融合治理机制建构

5.1 乡村社会危机日益凸显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诸多本质性及结构性的变化，城市

化的迅猛发展逐渐侵蚀传统乡村社会的存在形式,市场化的不断扩张使得农民与外部联系趋于紧密,内向的乡村经济开始向外部发展,这种变化更进一步加速乡村社会结构破坏。土地作为人们从事生产生活的主要场域,更是乡村经济的主要来源,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论述到:土地的占有不仅是一种法律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事实^[17]。由于外来经济体系的闯入,非本土经营者利用金钱将土地占有,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巨变,从事乡村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角色不再是农民而是资产阶级,乡村社会的治理规则也不再是由宗族、乡亲伦理为主而是法律所严格规定的行为标准。针对当前社会发展现状,韦晓康指出一系列乡村存在的社会问题,体现出现阶段乡村治理的迫切性,同时指出民俗体育文化以其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善治,传统社会衍生的民俗体育文化遗产作为非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延续着强劲的生命力和灵活性^[18]。杨青通过阐释太极拳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生产结构及民俗传统的共同体建构路径,提出以太极拳文化资源为依附的陈家沟乡村社会治理启示^[19]。所以,乡村武术更需要发挥其本身的社会功能,参与社会治理。

5.2 乡村武术、民间权威与乡村社会“三角关系”的建构

如图(图1)可以为我们清楚地描绘出一种基于民俗体育、民间权威与乡村治理三者的关系以及相互制约和促进等诸多可能性的稳定“三角关系”。这显然是在三种要素交互发挥作用所产生的一种逻辑性的治理空间,可以很清晰地体现三个要素所构成的关系模型。不妨以乡村治理(社会秩序)这一要素起点,按顺时针与逆时针两个方向依次与民间权威(第四种权威)、乡村武术(仪式)这两个要素连通构成两个双向循环轨道。这里只是以某一个要素为顶点,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整个系统中的最核心要素,我们所要营造的是外部稳定、内部有活力,且各要素之间保持相对平衡的动静结合的三角关系结构,因此这里我们所建立的应该是一个“等边三角”的关系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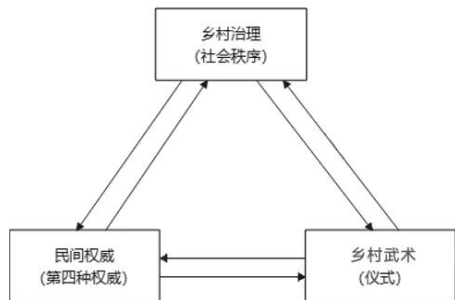


图1 民俗体育、民间权威与乡村治理的三角关系示意图

再以乡村武术(仪式)这一要素为起点。同主流文化一样,乡村武术文化也代表着地域特征,反映地域人民的价值意向及行动机制。宗教观念驱使人们产生共同的社会意识,当社会面临危机或者生活秩序打乱时,宗教所蕴含地对神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信仰与崇拜会驱使人们迫切地与神灵产生联系。传统乡村社会所衍生的乡村武术作为一种仪式活动,无疑是人们抒发意愿、发泄情绪的最好场域。人们也会愈发重视乡村武术(仪式)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进而使其得到保护与延续。同时这种相互转换的循环结构是对三要素的自我延续与更新创造。由此,乡村武术、民间权威与乡村治理的三角关系便得以建构,并逐步融入乡村治理模式之中形成新的、稳固的且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

5.3 国家权威促进乡村武术与乡村社会融合发展

乡村社会发展,发挥国家力量是根本。因此,基于本文上述的“三角关系”的治理模式,尝试融入国家权威,使其变为更为立体且稳固的“三角体”。这种建构主要是基于一种立体且直观的模式,无论某一个平面还是整体,它所具备的都是更为全面且稳定的特点。

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中,国家权威(官方权威)作为塔尖,一方面作为权力的存在,它具备无可否定性。国家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渗透到地方社会,且这种深入是具备合理性的,并对社会秩序发展起到多重作用。无论是深入乡村社会处理地方治理问题,还是管理民俗体育发展,抑或是对民间权威的赋予或限制,国家权力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使得三者归一。既能避免乡村地方治理过分依赖于传统民间权威而导致“极权主义”,同时可以扩大国家权力的渗透范围,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上来;另一方面,国家权威(官方权威)是一种符号的象征,乡村武术作为一种仪式活动则是这种符号得以在乡村社会完美呈现的重要场所。国家借助传统武术来展现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也可以进一步发掘它内在的文化及经济价值;同时,传统武术借助符号作用使其赋予官方效应,不但让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武术得到良好的保护和延续,也使得衍生于武术中的民间权威具有官方性质,地位也得到巩固。因此,国家权威的深入,既可保护乡村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同时这种良性互动更是加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并最终落脚在乡村治理问题上,既有利于国家与乡村社会更加广泛的治理,是治理机制的进一步更新与优化,又可以从根上保护优秀武术文化,让乡村武术得以延续,重放异彩。

文/杨斗¹, 冯言² (1. 扬州大学体育学院, 江苏扬州 225127; 2.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作者简介: 杨斗, 男, 湖北武汉人, 扬州大学体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 冯言, 女, 湖北武汉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参考文献:

- [1] 傅钢强, 耿文光, 夏成前, 等. 我国农村体育助力农村社会发展的历程回顾、使命延续和未来展望——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典型样本分析 [J]. 体育科学, 2020, 40 (8): 27-34.
- [2] 李萍, 汤立许. 乡土危机与行动逻辑: 民间体育与魅力乡村的融合治理发展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8, 52 (8): 56-61.
- [3] 高丙中. 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 42-50.
- [4] 廖上兰, 吴玉华, 肖锋, 等. 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及路径研究 [J]. 体育科学, 2020, 40 (11): 31-41.
- [5]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M]. 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6]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M]. 渠东, 汲喆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7] WACH J. Sociology of Relig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35.
- [8] (美) 奥戴, (美) 阿维德. 宗教社会学 [M]. 刘润忠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9] 方国清, 杨建营. 传统武术的信仰危机与文化重生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53 (7): 71-76.
- [10] 王若光, 刘旻航. “飞龙在天”: 端午龙舟竞渡习俗考源 [J]. 民俗研究, 2013 (6): 50-55.
- [11] 周子嵘. 广西大垌元宵节游神仪式与地方社会整合研究 [D]. 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12] 马志强. 变迁中的民间权威与乡土秩序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9.
- [13] 李松奇. 福柯后期思想中的权力问题研究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7.
- [14] 李晓斐. 当代乡贤: 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5 (4): 135-140.
- [15] 费孝通, 吴晗, 等. 皇权与绅权 (增补本)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16] 费孝通. 江村经济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 [17] 韦晓康, 蒋萍. 民俗体育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J]. 中国体育科技, 2016, 52 (4): 31-37.
- [18] 李文鸿, 吕思泓, 田海军, 等. 乡村武术传承人的社会行动——基于地方拳种调查的分析 [J]. 体育学刊, 2021, 28 (3): 43-48.
- [19] 杨青, 刘静. 乡村振兴视域下“以拳塑乡”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建构及治理——基于“武术之乡”陈家沟的田野调查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8 (1): 87-95.